

#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 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于健宁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关键词：**互联网；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动；制度背景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 (2014) 05-0152-05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较2012年底增加26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了2.0个百分点”。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和用户规模急剧膨胀，互联网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2010年，“王家岭矿难救援”、“方舟子打假”、“宜黄强拆自焚”、“李刚之子醉驾撞人”等一系列事件通过网络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2011年，“微博打拐”活动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行动引起全国关注，这些都彰显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并相继被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中。

人们不仅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越来越多的网民也会因为某个公共事件的影响，自发或有组织地聚集在某一个网络公共场域，进行网络集会、网络投票，甚至人肉搜索、<sup>〔1〕</sup>网络恶搞<sup>〔2〕</sup>等网络集体行动，或者通过互联网进行现实中集体行动的组织、交流和动员。<sup>〔3〕</sup>因此，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也成为了核心的关注点之一。<sup>〔4〕</sup>

围绕着互联网与集体行动这一研究主题，国外起步较早，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sup>〔5〕</sup><sup>〔6〕</sup>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一些进展，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等不同的层次、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集群行为到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运动等不同的切入点对这个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sup>〔7〕</sup><sup>〔8〕</sup>虽

然多元化的视角提供了多样化的分析工具，有助于人们深化理解两者关系，但也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使得现有的研究成果之间无法有效的进行沟通交流，特别是不能将现有的一些研究结论上升到理论层面，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特征所展现出的丰富理论意涵尚有待挖掘。因此，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国家社会关系下，本文试图回答，互联网对集体行动有哪些影响？是否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最后，本文借鉴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一个由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以便为今后研究不同条件下，研究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理论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打下基础。

## 一、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结合：网络集体行动的概念界定

广义的集体行动常指由相互关联的众多个体参加，为达到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包含了从突发的集体行为到正式社会运动在内的一个连续统，涉及了从草根组织到全球化社会运动，从宗教教派运动到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所有组织化政治表达形态在内”。<sup>〔9〕</sup>因此，作为一个学理性的统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表现为“集体抗争”、“集体维权”、“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等多种现象。<sup>〔10〕</sup>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产生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集体行动。作为信息技术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产物，网络集体行动既具有集体行动的核心特征，又呈现出自身独有的新特征。首先，参与的主体是网民，他们的身份往往是虚拟的，表现为符号性的ID或网名，具体到中国，根据《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的社会特征呈现出

〔收稿日期〕2014-02-21

〔作者简介〕于健宁（1986-），女，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以男性、城市居民、学生等最主要职业群体为主和老龄化的特点。其次，互联网作为主要媒介，不仅在集体行动的信息传播、组织动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时也直接成为集体行动的战场。最后，参与方式以文字和图像为主要形式，信息是网络集体行动中的核心公共物品。

基于此，本文将网络集体行动概念界定为“为实现某一集体目标，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而相互关联起来的一定数量的网民，采取在线或离线的某些策略与技术而共同参加的行动”。与传统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媒介的集体行动相比，网络集体行动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具有以下优势：（1）便捷性。网络集体行动中，依托互联网，信息的传递非常快捷，参与网络集体行动也很方便。（2）低成本。网络集体行动以互联网为组织动员媒介，其组织动员成本远远低于传统集体行动。（3）风险小。由于网络环境中，参与者往往使用虚拟的身份和网名，且信息来源难以追溯，网络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承担参与风险较小，因此使得行动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4）跨地域。只要接入互联网，不同地方的人可以跨越地域的阻隔而联系起来、共同行动，最大程度发挥集体行动的功能。

## 二、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对现有研究的反思

互联网的引入不仅产生了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运动，而且在三个层面上具体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即扩展机会结构、增加动员潜力并有助于框架建构。

其中，目前相关研究首要关注点是互联网的动员潜力。这一主题的研究强调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信息沟通媒介，成为集体行动组织动员新途径。首先，互联网的远程传播能力、快捷的信息传递及较低的沟通成本、信息量大及参与匿名性等特点便于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sup>〔11〕</sup>其次，互联网中传播的传闻、谣言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使之产生普遍一致的行动目标与聚集行动的心理能量，从而起到情感动员作用。<sup>〔12〕</sup>最后，互联网能有效促成舆论的积聚和放大，将单一的社会事件借助互联网可以在传播和扩散过程中转变成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公共问题的确认和政策议程的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sup>〔13〕</sup>

朱力和卢亚楠<sup>〔14〕</sup>试图将互联网的上述动员能力进行整合，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聚动员和外扩动员。内聚动员指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可以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将集体行动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外扩动员指网络人际传播可以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动提供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持，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集体行动的处理。因此，在大规模集体行动发育和扩散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和舆论平台，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此外，也有研究从网络动员角度详细分析了网络社会动员的成因、特点、过程及机制，认为网络动员过程中包括事件的发生、网络热议及网络动员和付诸现实行动三个程序。这其中，话语建构和资源利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动员的诸结构性因素对于网络动员及集体行动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sup>〔15〕</sup>

因此，现有研究的确揭示了互联网为集体行动动员带来

便利条件，但是互联网在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互联网作为动员工具的有效性条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在动员策略、动员机制上与传统媒介相比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以及在动员结构上网络集体行动与传统集体行动是否存在根本不同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明确解释，因而无法进一步揭示传统动员理论在解释网络集体行动动员问题时的适用范围，不能有效地将相关的研究结论整合进动员结构的理论框架。

其次，互联网对于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它对机会结构的扩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强调互联网提供的沟通渠道能通过降低国家对信息和政治沟通的管控能力，为集体行动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互联网的网状结构使信息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任意节点在任何时间传播到网上，因此掌控成本非常高，政治压制的风险也随之降低。<sup>〔16〕</sup>另一方面，互联网可以突破具体的时空限制，有助于跨国集体行动的产生。<sup>〔17〕</sup>这使得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也不断地受到来自国际联盟的影响。

具体到中国，互联网对机会结构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提供了重要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首先，互联网有助于拓展公民非制度化参与途径，在政治系统和公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信息沟通桥梁；其次，互联网有助于信息的多元化，降低政治控制，便于公民公开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同时降低了参与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成本与风险，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参与能力；最后，互联网开放、自由、平等特性以及网络言论多元性有利于扩大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sup>〔18〕</sup>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国家、政治等因素，特别是中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互联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尚有待商榷。虽然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肯定了互联网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他们也似乎一致认为，国家的控制能力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被彻底削弱。<sup>〔4〕</sup>

实际上，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是多方力量不断动态博弈的结果。一方面涉及政府的管控能力和管控程度，另一方面则涉及集体行动者利用技术突破现有管控的能力和投入。因此，互联网对集体行动机会结构的影响研究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意义的探讨上，而是需要深入到具体的案例分析中考察互联网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最后，互联网对集体行动中框架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作为新生的公共领域，成为集体行动产生的温床。<sup>〔19〕</sup>互联网这个新生的公共领域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媒体空间，来对事件进行阐述和报道，进而可以影响公共舆论，导致集体行动。黄荣贵将之概括为公共领域的模型，该理论模型中具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互联网对政治讨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在线领域，也可能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并且反过来政治讨论也会促进政治参与；第二，在线讨论的过程同时也是公共舆论（至少是群体舆论）形成的过程，本质上讨论的过程是参与者对所讨论事件的再框架化的过程，该过程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促进抗争的行动者。互联网上多样化的讨论平台，比如QQ群、邮件组、在线论坛等，与传统的媒介相比，具备更多的优势：



第一，其参与者更为广泛，参与者的观点也更加多元化；第二，成本更低，在线讨论过程中，选择加入讨论的时间与地点参与者可以自由。<sup>[4]</sup>此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改变了互联网出现之前，参与者与传统媒体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话语权不再为少数媒体所垄断，不同立场的参与者、不同的声音都有表达的机会。互联网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而且对大众话题的议题设置功能也在不断强化，网民已在逐渐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比如，互联网已经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曝光台。<sup>[20]</sup>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及其用户构成了公共舆论生产和问题界定的行动网络。

但总的来看，目前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从互联网所营造的公共领域到公共议题的设置、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再到集体行动的产生，这整个逻辑链条各个环节的具体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既有的框架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解释框架，但是在新的情景下，其适用范围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 三、不同条件下的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

现有的研究虽然关注到网络集体行动和传统集体行动的差异，以及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但主要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互联网对集体行动产生的积极作用，没能详细的区分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情景和不同组织特性，没有区分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和技术使用习惯差异，也没有区分互联网内部不同的功能应用，进而无法明确不同条件下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产生和目标达成的具体机制，也就不能进一步理解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深刻差异，以及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什么意义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共享的前提。

传统的集体行动研究发端于西方，以欧洲和北美这两个社会文化地理区域为代表。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非理性行动模型为核心的“古典时期”，二是以理性行动模型为代表的“主流理论”时期，三是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综合时期”。<sup>[21]</sup>

无论以非理性行动模型为核心的“古典时期”，还是以理性行动模型为代表的“主流理论”时期，或是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综合时期”，三个阶段的集体行动理论虽然在理论假设、核心概念和问题以及适用范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矛盾，但是它们都共享了以下一些前提：集体行动都处在面对面的互动的发生情景之中，因而运动的参与和组织都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以电话、通信、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为动员、组织的技术载体，以人际网络为主要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渠道，以社区、地区和民族国家为主要行动的地理边界，并且在传统的集体行动中，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运动是主要集体行动类型。

互联网作为一个集体行动产生的新媒介，区别于传统媒介最主要特征是它在功能和资源上的整合，即将信息的产生、加工、集聚与扩散集中在一起，使接入互联网的用户能够便捷低成本的享受到海量信息资源，并也能相对自由地加入到信息生产过程，所以对互联网功能和应用模式的把握是理解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基础。故在一般意义上，互联网能够扩展下述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一是互联网的出

现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扩展了集体行动发生的环境，即在传统的面对面的互动的现实空间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二是互联网提供了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参与组织的可能选择，使得集体行动的产生不必依赖于大量资源，结构松散、组织规模较小的集体行动发生因此得以可能；三是互联网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低成本、多样化的讨论平台，改变了互联网出现前，参与者与传统媒体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打破了话语权垄断局面；最后，互联网的出现使得集体行动不再为民族国家或其他地理边界所限，有助于跨国集体行动的产生。

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为参与者主要提供了信息获取渠道、信息发布平台和沟通互动工具，具体的技术应用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通讯（如即时通讯，电邮）、社交（如facebook，微博、论坛）、资源共享（如门户资源、论坛资源）等类别；按照发展时间先后可以分为Web1.0时代以文本传输为主的应用，如电子邮件、公共论坛和万维网，Web2.0时代以个人生活化为核心的应用，如博客、社交网络等。<sup>[22]</sup>而不同应用在集体行动中的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存在差异，但这一点常常被现有研究忽略。因此，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中不同技术应用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要来源是网民，但不同网民的社会特征、网络技术能力和使用习惯都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些参与者的社会特征与互联网使用习惯对集体行动参与行为的影响。有研究指出，互联网的不平等接入机会、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会对集体行动参与存在影响。<sup>[23]</sup>比如，刘德寰和刘迪通过对网络人肉搜索主体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了网络人肉搜索参与主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基本网络使用情况以及具体的网络参与行为对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程度。<sup>[24]</sup>但社会特征具体哪些维度、使用行为中怎样的习惯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参与行为尚缺乏实证研究，特别是其中具体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明确的揭示。如果考虑到集体行动中行动者不同的角色扮演与其社会特征、使用行为的交互影响，进而影响集体行动的参与行为，问题将更为复杂。因此，这方面的相关问题还有待深入的探讨。

如前所述，现有研究中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Garrett (2006) 基于McAdam等 (1996) 学者提出的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论架构，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文中，他指出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可区分为以下三种，即“互联网对动员结构的影响”、“互联网对政治机会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对框架化过程的影响”。其中，他将动员结构进一步操作化为参与水平、抗议行动和组织问题，探讨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而在互联网对机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互联网影响了全球经济过程，促进了跨国经济活动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国际层面的政治机构结构，同时经济全球化过程与跨地区合作的日益增多，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也被国际事件和联盟所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开放的特征也降低了国家对信息和政治交流的管控能力。最后，互联网对于框架化过程的影响体现在：互联网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网络来促进不同“框架”的传

播，互联网上内容的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可，但与此同时网民的期待也增加了行动参与者生产议题相关内容的压力。<sup>[25]</sup> 黄荣贵（2010）则进一步阐释了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动员过程的不同机制。通过对互联网与抗争行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常规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的回顾，归纳出“信息流”、“社会资本”以及“公共舆论（及公共领域）”等三个主要理论模型。<sup>[4]</sup> 但是，既有理论研究结论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在中国特殊制度环境下，具有不同技术使用偏好和技术能力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如何利用互联网不同的技术应用影响集体行动的产生与维持尚有待更加丰富的经验研究加以论证。

而任何一个集体行动的产生都嵌入在特定制度背景之中。因此，中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影响了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不论是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组织动员过程还是框架化过程的影响，在这三个层面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都会影响互联网实际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目前，在对国家控制和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关系的讨论中，存在着“政治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政治决定论”支持者认为，政府能通过充分的工具和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和控制，而“技术决定论”者的意见恰恰相反，认为互联网有能力突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从而带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但实际上，这两种取向都存在问题。因此，只有具体分析互联网、集体行动、常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作为充权工具”以及“政府管理互联网”之间的紧张关系。<sup>[4]</sup>

综上，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共包含四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藉此可建立如下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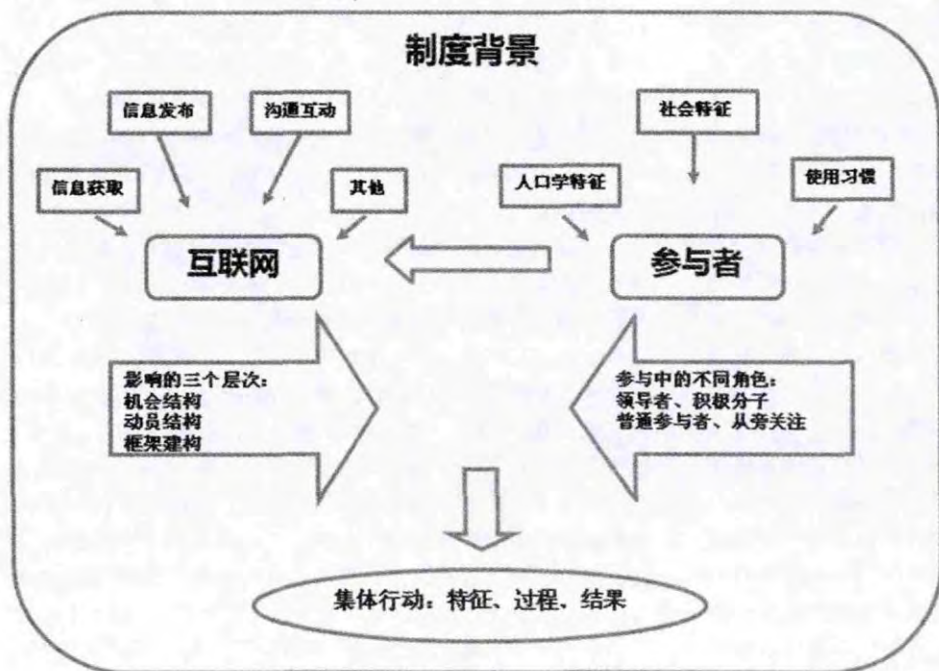


图1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主要包含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和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其中，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社会特征和技术使用习惯的参与者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来参与集体行动，互联网通过影响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建构来影响集体行动的特征、过程和结果，而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即领导者、积极分子、普通参与者或是从旁关注，从而不同程度的参与到上述过程。互联网、参与者和集体行动及其相互关系又整体嵌入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受到一个国家特定制度环境的制约。因而，未来的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研究，参考这个分析框架，将需要进一步研究四个要素不同情况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以深化理解不同具体条件下的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魏盛礼, 唐薇.网络人肉搜索现象的法理分析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 (11): 150-153.

[2] 聂晶磊.网络恶搞的特征、原因与对策 [J]. 新闻界, 2009 (4): 58-59.

[3] 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 [M].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207.

[4] 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 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J]. 社会, 2010 (2): 178-197.

[5] Diani, Mario.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 3 (3): 386-401.

[6] Gerhards, Jurgen and Schafer, Mike S. Is the internet a better public sphere? Comparing old and new media in the USA and Germany [J]. New Media and Society, 2010, 12 (1): 143-160.

[7] 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 基于网络的视角 [J]. 求实, 2009 (2): 44-48.

[8] 杜骏飞, 魏娟.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 本质、类型与效用 [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 43-51.

[9] 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J]. 开放时代, 2004 (4): 57-70.

[10] 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7 (5): 31-35.

[11] 张雷, 刘曙光.论网络政治动员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 145-149.

[12]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 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J]. 传播与社会研究, 2009 (9): 39-66.

[13] 黄丽华, 姜晓宁.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

[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39-42.

[14] 朱力, 卢亚楠.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 [J].江苏社会科学, 2009(6): 84-90.

[15] 晏荣.网络动员: 社会动员的一种新形式 [D].北京: 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 2006: 1-68.

[16] 杨国斌.网络空间的抗争 [M] //陈周旺, 刘春荣主编.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60-77.

[17] Langman, Lauren.From Virtual Public Spheres to Global Justice: A Critical Theory of Internet worked Social Movements [J].Sociological Theory, 2005, 23(1): 42-74.

[18] 周巍, 申永丰.论互联网对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J].湖北社会科学, 2006(1): 36-38.

[19] 陈剩勇, 杜浩.互联网公共论坛: 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 [J].浙江大学学报, 2005(3): 5-12.

[20] 周伟.“民间反腐”力量在互联网的土壤中成长 [J].政府法制, 2008(19): 13-14.

[21] 刘能.社会运动理论: 范式变迁及其与中国当代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 [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4): 76-82.

[22] 许玲.网络行动: 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与对抗政治 [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8-97.

[23] Lerner, Melissa.Y.Connecting the Actual with the Virtual: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the Muslim World—The Cases of Iran and Egypt [J].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2010, 30(4): 555-574.

[24] 刘德寰, 刘迪.谁在人肉搜索? ——网络人肉搜索主体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J].广告大观(理论版), 2010(2): 60-67.

[25] Garrett, R.Kelly.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 s and New ICTs [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6, 9(2): 202-224.

责任编辑: 余 弓

## Internet And Collective Action: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Yu Jiann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affect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extending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the mobilization potential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well as providing a platform of public opinion that independent of the official media.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collective action extends the premise of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in four aspects: extending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collective action occurs; reducing organizational costs; breaking the discourse monopoly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from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for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eds to be placed i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actors, the Internet, collective actio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Only by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the four elements that mentioned abov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can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llective action.*

**Key words:** internet; collective action; network collective actio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